

泰山不让土壤 河海不择细流

——记奋进中的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

□ 本刊记者

天津财经学院坐落在美丽的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在这座学院里,有这样一个会计学系:拥有教职工60余人、本科生1000余人,具有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社会培训多层次办学能力,为天津财经学院的第一大系。她在科研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已呈现出勃勃生机,亦成为我国北方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教育的重要基地。

谦逊奋进 迅速成长的年轻学者

那是2000年的8月份吧,我应邀到厦门大学参加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2000年年会。在这次年会上,结识了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的吴彦龙老师。那时的吴老师虽然已是副教授了,但为人仍十分谦虚。他听说我是《财务与会计》的编辑、记者,就利用休息的时间来“请教”我。说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无形资产的文章,想投给《财务与会计》杂志,但又不知道自己所写的是否符合《财务与会计》的用稿要求,所以希望与编辑老师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吴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的年轻教师,他的谦逊和热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吴老师投给我们的第一篇稿件未被采用,但从此,我和吴老师之间,就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现在的吴老师已获博士学位,他的文章亦屡见于报刊,已成为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的科研、教学骨干。还有年轻的田昆儒博士,几年前就已是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但每次见面,

他都会主动向我们介绍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并说,如有时间和机会,一定要将自己最新研究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值得广泛讨论的科研成果整理出来,先寄给你们,请多指教等等。像吴老师、田博士这样谦逊奋进、不断进取的年轻学者在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还有很多。也正因为有了他们,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才显得充满生机与活力。

身先士卒 盘活会计学系的系主任

也是2000年,那年11月份,由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主办的天津市无形资产研究会筹备成立大会在天津召开。我作为记者应邀出席。在那次会议上,我对会计学系主任王建忠教授有了一些了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次会议因为定在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天士力离天津财经学院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所以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就动用了一辆大客车来回接送与会代表。那一天,开完会已较晚,天都快黑了。当大客车到达目的地——天津财经学院时,王教授对大家说:“让老同志先下车吧。”接着他自己就站到了车门口,一一搀扶着老教授。我当时很感慨,王教授真是个好有心之人。

这次会议不久,已到了2000年的岁末。为给2001年《财务与会计》的读者送去一份喜悦和一份厚礼,让历史为中国跨千年会计记上厚重的一笔,在2000年11月初的时候,编辑部精心酝酿了2001年“迎新特刊专稿”,这其

中就有一项——“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古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故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此世纪更替之际,回顾百年会计历程,咀嚼个中辛甘滋味,以此告慰昨天、启迪来日。这也是《财务与会计》策划编撰此“决算”的初衷。按照编辑部的工作程序,2001年的第1期在2000年12月15日就要发稿。尽管时间非常紧迫,也尽管王教授公务繁忙,但对《财务与会计》的特别约稿,他还是欣然应承了下来。当大家都在忙于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王教授却在夜以继日地查资料,输文字。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当长达几万字的“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文稿预期交来时,责任编辑除了感动,已不能用言辞来表达对王教授的感谢。事后,责任编辑曾经问过王教授,那段时间是不是特别劳累,王教授笑笑点点头。他说,劳累倒不算什么,一天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也能打熬住,关键是任务重,责任大,怕辜负《财务与会计》的期望,怕让读者失望。所以除了劳累,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终究还是凭自己的积累把这个“决算”做了出来。尽管有些不足,但已是尽责尽力了。这就是王教授,一位谦和、实实在在在做学问的人,一个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年轻教授。

王教授不仅尊老敬贤、勤勉治学,知情人更了解到他作为系主任为了盘活会计学系这盘棋,又是怎样地煞费苦心。

为适应社会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他组织申报了财务管理本科专业,

使会计学系融会计学与财务管理本科层次双专业、硕士博士层次双方向为一体,研究方向交叉,研究成果互补,实现了教育与研究的宽口径与厚基础;为配合学院的行政安排,成功地完成了审计系并入会计系的工作,使会计系成为包含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学科的学院第一大系;重建了会计实验室和计算机房,更新改造了会计学系资料室,添置了大量教学科研资料和设备;为鼓励广大教师安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他带领系领导班子制定积极的资助和奖励政策,会计学系教师凡是对外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申请和完成的科研项目,都会得到系里不同程度的奖励。

王教授在教学、科研和担任行政职务外,身兼很多的社会职务:中国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员、秘书,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无形资产研究会常务理事,等等。他在会计史学方面取得的诸如中国古代会计思想、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演变、会计史学系的建设等研究成果得到了会计界的充分肯定。他协助李宝震教授、于玉林教授主编的会计著作、教材或工具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会计学系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勤勤恳恳、身先士卒的系主任,才有了迈开了大步朝前走的动力和机制。

甘做人梯 无私奉献的“第二梯队”

在天津财经学院有一位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他就是求实奉献的博士生导师——盖地教授。

盖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1969年留校任教至今,长期担任着本科生、研究生的会计教学任务。在教学中,他要求学生要广征博览,勤于思考。正如他在其主编的《财务会计学》“前言”中所写:“通过会计教学,不仅希望学生掌握其中的专业理论、方法和技能;更要求学生逐步形成会计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不论现在和将来,不论从事何种职业、担任何种职务,都能够用会计人的眼光,从会计的角度去看社会、看人生。”在教学之余,他潜心会计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了对我国各种非国有企业会计的探讨,先后编著、主编了《城镇集体企业会计》、《乡镇企业会计》。从1985年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又率先在会计专业开设了“税务会计”课程,并先后主编了《企业税务会计》、《税务会计学》、《纳税申报与纳税筹划》、《增值税会计》等。

早在1986年,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从其他学科独立出来,盖教授曾先后担任会计学系副主任、主任。为了多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如今仍不过60岁的盖教授,已于数年前就退居二线。他不恋位、不揽权,却把自己作为教师和学者具有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传承给了年轻的一代。

还记得一件关于盖地教授的事情。那是在“安然崩塌”之际,编辑部约请盖教授就此事件写一篇“特约观察”,盖教授在预定的时间内将稿件发了过来。责任编辑看了,文章虽然是按要求写的,但还需要精炼,部分地方要做补充修改。盖教授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教授,而且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责任编辑在给盖教授打电话说明文章需要修改时,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但出乎意料的是,盖教授很爽朗,并十分谦虚地说:“文章达不到发稿的要求就要修改,修改一次不行,改两次;两次不行,改三次。我们作者也要对刊物负责,对读者负责嘛。”有这样一丝不苟的作者,我们作为责任编辑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奉献给读者以精品呢?

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为加强学科建设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选送教师到国外进修,鼓励青年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执行教师学术假制度,资助教师的科研成果研究,确定一对一的教师传帮带关系,组建老中青课

题组承担科研任务,奖励取得教学科研成果的教师,支持教师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为使年轻的教师成长壮大起来,像盖教授这样的知名老教授却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奉献着。正所谓:甘于寂寞不为名,成人之美做人梯。

勤学勤勉 不懈追求的老前辈

于玉林教授算得上是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的老前辈了,在我国会计学界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在早期的会计研究中,他曾与我国的老一辈会计学家李宝震教授一起,为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他自1960年以来一直从教,并长期从事现代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主编、参编、编著各种会计书籍70余部,发表论文280余篇。199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98年被评为天津市教育系统“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获“九五”立功奖章,获天津市2000年教学成果二等奖,等等。40多年来,于教授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经于教授培养的专、本科生约4000余人,硕士生8人,博士生30余人。那么,在于教授这些闪光的成就背后,又演绎着他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他有艰苦奋斗、求实求真的精神。

于教授1934年出生于湖北建始山区。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在一个小单位做会计。但他非常渴望学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抓紧点滴时间自学,一个星期学会计,一个星期学统计,轮流交叉着学。单位没有可供学习的书,就自己买书看。那时,关于会计、统计方面的书很少,所以要买到一本自己想要的书非常艰难。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学习。他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学习就是要靠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在实践中学,在工作中学,学

以致用。那时候,自己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对待工作也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每个月要对自己所管的账和仓库进行实务盘点。几分钱对不上账,也要查清楚,有时查到晚上两三点钟,直到弄明白为止。

1956年,是于教授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国务院号召在职干部“向科学进军”。当时南开大学面向社会招生,报名的有两三百人,只招寥寥的几个,竞争非常激烈。于教授由于平时从未放松学习,所以顺利通过了考试,并被南开大学录取。于教授说,对当时入学的情况,自己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学校都开学了,自己还在单位盘点清查,手上的工作没有人来接,学校开学快一个月了,自己才来到心仪已久的学校。对他来说,学习机会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来到学校后,因为自己的底子比较差,所以就利用分分秒秒弥补充实自己。他说,当时自己在学校里面,就做两件事情:一是锻炼身体;二是学习。四年大学期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利用寒暑假看了很多书。《资本论》反复看了好几遍,《反费尔巴哈论》、《毛泽东选集》也看了不下两遍。他认为,知识水平的提高靠的就是天天学,天天记,没有半点捷径可走。

从学校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天

津财经学校当老师。那时会计教材稀缺,没办法,就下企业,搞调查,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他说,那时候要编一本教材是多么艰难,你可能想象不到。自己和一位老师,去了上海的几家大工厂,调查他们的经验、做法,去湖南的一家大企业调查他们的成本核算,去了广州的好几个工厂,最偏的去了延安的一个油矿。边远的地区,交通不便,大部分路途靠双腿走。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为学生编写出了学以致用用的教材。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都要拿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到实践中去解决。有一本教材,就曾经做了反复修改,修订过8次。

于教授说,那一段生活,虽然艰难,苦涩,但却最值得珍藏和记忆。每每忆及那段生活,心里就有种满足和自豪感。正是那种感觉,让他更珍惜眼前美好的生活。

——他有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气魄。

他常说:科学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是创造性思维活动,追求真理应放在第一位;科学研究应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讨现实问题;研究问题要多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前提

下,他提倡科研“三无”——“无顶峰、无禁区、无绝对权威”。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教授以开拓的精神,先后研究的方面有:会计系统工程学,会计法学,会计工作的现代化,会计方法学,会计教育学,会计哲学,大会计学。

——他有勤学勤勉、不懈追求的执着。

前几年,于教授的老伴因病去世,几个子女又不在身边,显而易见,于教授的工作和生活存在着许多的困难。每当会计学系的老师对他的生活表示关心时,他总是笑笑说:“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他说,现在他每天有两件事是坚持不懈的:一是早上5点钟就起床锻炼身体,雷打不动;二是学习和工作。尽管于教授年近古稀,但他每天学习、工作到晚上12点,连年轻人都自叹弗如。

于教授正因为具有了这些优秀的品质,才让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的教师们,感觉到了不断奋进的压力和动力。

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因为有了这些勤学奋进的年轻学者和不懈追求的老教授们一点一滴地苦心经营,才变得与时俱进、日益丰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建议·

对首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应用追溯调整法的一点看法

□ 李慧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规定,对首次采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企业,应该采用追溯调整法。笔者认为如此处理并不合理。首先,难以准确确定累积影响金额;其次,应用追溯调整法无法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现以固定资产为例子以说明。假设2002年12月31日我们首次认定某项固定资产已发生减值损失100万元,那么如何对该固定资产的减值损失进行确认呢?如果采用追溯调整法,我们必须能够合理地估计2001年12月31日、2000年12月31日直至该资产投入使用当年的可收回金额。否则,企业只能将这100万元的减值损失在资产持有期间进行任意分摊,这样,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就难以保证。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其颁布的IAS36《资产减值》中指出,由于很难追溯确定原先对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在采用本准则时,不要求企业执行IAS8《当期净损益、重大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中所规定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基准处理方法或允许选用的处理方法。同时,IAS36还明确指出,该准则只在未来适用法的基础上采用。可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首次采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是支持采用未来适用法的。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企业首次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不应该采用追溯调整法,而应该采用未来适用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

责任编辑 张玉伟